

缪钺先生与《三国志》的整理研究

方北辰

西晋史学名家陈寿所著的《三国志》，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传世文献之一，向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并称“前四史”，共为纪传体史书的冠冕。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，对《三国志》的整理研究，早在南朝刘宋时裴松之注释此书即已正式开始。此后师祖者不绝，至有清一代形成洋洋大观。本世纪以来，特别是五十年代之后，众多当今学者运用新观点、新材料以及新方法，继续对这部不朽的历史文献进行整理研究，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，使《三国志》的整理研究更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。在这些学者当中，有一位成绩突出而道德高尚的蔼然长者，他就是四川联合大学（四川大学）历史系教授缪钺先生。

业师缪钺先生字彦威，祖籍江苏溧阳，幼时随家人侨寓河北保定。1924年冬，因父歿，先生遂从北京大学文科辍学，教书以赡养家人，开始了长达七十年的教育和学术生涯。先生家学渊源，天资慧颖，加之治学勤奋，思想开放，终于在学术上卓然成为通人名家。其学术成就文史兼长。文学方面，尤以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享誉士林。史学方面，先生除在魏晋南北朝史的考论上有精深造诣之外，又对《三国志》的整理研究多所致意。本文拟就此作一概略叙述，既为二十世纪文献学发展历程的回顾提供资料参考，亦借以纪念先生逝归道山二周年。

先生对《三国志》的整理研究，是从编著《三国志选》一书正式开始的。60年代初，为了给全国高等院校历史系的“史学名著选读”课程提供一套优质教材，当时的教育部委托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先生主编“中国史学名著选读”丛书。郑天挺先生决定首先编选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六种名著，并延请全国学有专攻的名家，担任各书具体的编选和注释工作。其中的《三国志选》，即请业师一人负责。1962年8月，《三国志选》的编选和注释工作告竣，与其他五种史学名著的选注本（包括徐中舒先生《左传选》、来新夏先生《史记选》、冉昭德先生与陈直先生《汉书选》、束世澂先生《后汉书选》、王仲荦等先生《资治通鉴选》）一起，由中华书局出版。

《三国志选》选注纪、传19篇，全书约20万字。在本世纪出版的众多《三国志》白话注本中，这是问世很早的一种。它虽然属于大学历史系本科学生教材的性质，却依然表现出鲜明的学术特色。首先，从其选录的标准来看，除了选入著名的政治人物、军事人物之外，还对在发展经济方面业绩突出的人物（如任峻、郑浑、仓慈等），在创造文化和研究科技方面贡献巨大的人物（如曹植、华佗等），以及周边活动的少数民族（如乌丸、鲜卑等），给予充分的重视。这正是当代学者新观点的体现。其次，全书的注释虽然在文字上力求简明通俗，但在内容上却极为精当。例如《武帝纪》中“光和末，黄巾起”句，注文在说明是汉灵帝的年号之后，接着解释：“光和七年（184）改元中平。通常说，黄巾起义在中平元年二月；实际上，这一年十二月才改元，当黄巾起义时，还是光和七年。”以上注释，不仅有助于纠正习惯说法在读者中造成的误解，还能增进读者在年号和纪年方面的知识。

由于此书具有以上优点，所以出版之后大受欢迎。至1991年2月，初、再两版即已印刷17次，累计印数达到近26万册。其读

者亦不限于大学历史系的本科学生，而是扩展到社会各界的历史爱好者，从而为《三国志》这部史学名著的流传和普及，起到了强劲的推动作用。

1978年拨乱反正，文化复兴。中华书局出面邀约学术界名家，编写一套较大规模的“中华文史哲名著选读”丛书。鉴于此前《三国志选》的成功，故而其中的《三国志选注》一种，仍请先生承担编选和注释的任务。由于后者预定的文字分量是前者的三倍，而此时先生又患双眼白内障有年，视力衰损，独力承担此项任务相当困难，于是与中华书局商定，由先生出任主编，指导四川大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的马德真、朱大有、杨耀坤三位教师，进行具体的编写工作。在先生的主持下，首先研讨体例，确定篇目，商议方法。开始编写工作之后，诸人遇到疑难问题，随时向先生请示解决。对于较难注释的篇章，先生则勉力审阅了注稿，提出修改意见。有时还亲自撰写注条，以作示范。最后又亲自撰写前言一篇，深入评述陈寿及其《三国志》。全部工作历时两年完成。1984年6月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册出版，全书选注纪、传43篇，近60万字。

与此前的《三国志选》相比，《三国志选注》在选录标准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，大大扩充了入选的篇章数目，使内容更加充实丰富。但是变化最大者还在注文方面。由于《三国志选注》不是大学教材，在出注时，不必考虑为教师的讲授预留一定的余地，也没有文字总体分量的限制，因而可以畅所欲言，充分发挥，从而使注文的学术性更加突出。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1985年第141期，曾经刊载王而山先生的长篇书评，详述《三国志选注》学术方面的优点，颇为中肯，兹扼要转列如下：第一，缪钺先生撰写的前言，对《三国志》的作者、成书、旧注做了详尽的阐述，对一些学术界有分歧的问题，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可以说是《三国志》研究的新成果。第二，对入选篇章的裴松之注也作了详明的诠释。裴注的史学价值很高，但

是并不容易阅读，不少地方读起来比陈寿的书还要困难。因此，注《三国志》如果不注裴注，可以说只是做了一半的工作。以往《三国志》的选注本尚无兼注裴注者。《三国志选注》是对裴注第一次作白话的新注，这是学术上很突出的特点。第三，注释广泛吸收了前人旧注和当今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。例如《武帝纪》中注释“赤壁”时，先介绍古今聚讼纷纭的概况，而后参考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》1979年第1期杨贯一、丁力之论文，确定赤壁在今湖北蒲圻县西北。第四，对卢弼的《三国志集解》亦间有补正。卢书虽然是《三国志》旧注集大成的著作，仍有阙漏违失。如《武帝纪》裴注引《魏书》之“前后重沓”一语，胡三省《通鉴释文辩误》对前人解释“重沓”为“重足着地”有所辩驳，却未能指出其确切含义。卢弼仅照录胡氏之文而无所发明。此书则考引《颜氏家训·书证》，注为“人多拥挤之意”。又如同篇裴注引《九州春秋》中“虞舜舞干戚”句，卢弼引伪《古文尚书·大禹谟》作注，显然不妥，此书则改引《韩非子·五蠹》。第五，注释对地名的考证非常精确。三国的史事，有许多发生在巴蜀。选注者为了弄清一些重要地名的具体方位，还进行了实地的考察。如《邓艾传》中的德阳亭，此前的注家都说是在今四川江油市的马角坝，但经注释者实地考察，确认在该市的雁门坝。王而山先生在详论《三国志选注》的多方面优点之后，认为此书是一部值得欢迎的好的古籍注本。

除了中国大陆的学术界之外，此书在海外也受到日本、美国、瑞典等国汉学家的好评。并于1986年再版。

在《三国志选注》出版之后两年，蔡尚思先生受巴蜀书社的委托，主编“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”。这部丛书的重点在于“导”，即通过丛书引导广大读者正确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要籍，所以作者都邀约对该古籍素有研究，成就卓著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第一流专家担任。其中的《三国志导读》一种，自然又延请缪钺先生撰稿。先生大体按《三国志选注》的办法，指导

四川大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马德真、朱大有、杨耀坤三位教师开展具体工作。根据丛书的既定体例,《三国志导读》全书不超过20万字;其内容分为两大部分,即导读与选文。先生自己撰写导读中的“陈寿《三国志》评介”一节,又指导三位教师撰写其余三节,即“如何阅读《三国志》裴注”、“读《三国志》的几个方法问题”、“研读《三国志》参考书简介”。选文部分,是从《三国志选注》中抽出五篇,加以补充修订。全书于1987年3月出版问世。同时出版的还有杨伯峻先生的《左传导读》、顾廷龙先生的《尔雅导读》等。

以上三部著作,构成了缪钺先生在《三国志》整理研究方面的著作系列。它们不仅具有长存的学术价值,而且对《三国志》在广大群众中的传播和普及,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。三书出版之后,先生不时收到普通读者的来信,请教三国历史文化的种种问题,先生总是给予详尽的解答。其广泛影响,由此可见一斑。

二

对《三国志》及其作者陈寿撰写单篇论文进行研究,是缪钺先生在《三国志》整理研究中另一方面的贡献。1962年,先生在《历史教学》第1期发表《陈寿与〈三国志〉》的论文。后来《三国志选注》一书的前言,即在此文的基础上增订而成。1985年,先生又应中州古籍出版社之约,为《中国史学家评传》撰写其中的《陈寿评传》一篇。在这三篇论文中,先生除了对陈寿的生平事迹进行梳理介绍,对《三国志》的立传标准、史料取舍、文字特色等进行评论分析之外,还特别就以下一些向来有争议的问题,做了深入细致的考辨。

首先是关于陈寿修史的态度问题。《晋书·陈寿传》在肯定《三国志》的价值之后,又记载了两件事:陈寿向丁仪之子索取谷米不成,遂在《魏书》中不为丁仪兄弟立传;诸葛亮曾处罚过陈寿的父亲,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又轻视陈寿,所以陈寿在《蜀

书》中对他们有不公正的评语。先生广泛征引前人的不同说法，加以客观分析，而后作出判断：《晋书》所载二事都是不足信的。其次是《三国志》以曹魏为正统的问题。东晋习凿齿撰《汉晋春秋》，开始对陈寿的作法提出异议，主张以蜀汉为正统。南宋朱熹以后，多赞同习凿齿而非难陈寿。先生认为：陈寿是西晋朝臣，而西晋继承曹魏，陈寿以曹魏为正统，是封建史家照例的作法。这种是非的争论，在今天并无多大的意义。同时又指出：陈寿在思想感情上仍然倾向于蜀汉，常以巧妙的笔法以寄托其深意微旨。第三是《三国志》中时有曲笔，多为司马氏隐恶溢美的问题。刘知几《史通》卷七《直书》、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卷六“三国志多回护”条都曾举出若干例证。先生认为这确实是《三国志》的缺点，但是陈寿身为晋臣，又来自灭亡了的蜀汉，当然不便也不敢揭发和批评司马氏。不过，陈寿在某些地方，仍然冒着危险使用微妙曲折之笔法，揭露一点自己与司马氏心意不合的意见。此外，对于曹魏与孙吴刑政的苛虐，徭役的繁重，陈寿却是据事直书，毫无掩饰。就总体情况而言，陈寿在史料的取舍选择上是非常谨严谨慎的。这些难能可贵之处不应当一笔抹杀。

1983年，先生在《读书》第9期著文，考辨《三国志》的书名问题。当时印行甚多的中华书局标点本《三国志》，在其“出版说明”中介绍说：魏、蜀、吴三书本是各自为书，到了北宋雕板，始合为一种，改称《三国志》。先生认为：这虽然是小的疏误，却有可能引起广大读者的误解。文中以《晋书·陈寿传》、《华阳国志·陈寿传》、《宋书·裴松之传》、《魏书·毛修之传》、《隋书·经籍志》的确凿记载为证，说明自西晋、东晋、南北朝以至唐初，都称陈寿所著之书为《三国志》。其得名并非晚在北宋之时。后来中华书局重印此书，及时采纳了先生的正确意见，将有关的文字删除。

文献学家研究历史文献的流传，向来重视所谓的“祖本”，即最早问世的版本。陈寿的《三国志》有没有“祖本”？先生曾在

《书品》1991年第2期发表文章，题为《〈三国志〉传抄本的“祖本”》，探讨了这个问题。先生认为：完成于西晋时期的《三国志》，开始是以传抄本的形式流传，1924年新疆鄯善县和1965年新疆吐鲁番市英沙古城出土的两种晋代手抄本《三国志·吴书》残卷，便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传抄本。至于传抄本的“祖本”，尚可从文献的记载获得一些线索。《晋书》卷82《陈寿传》记载陈寿死后，西晋王朝曾“诏下河南尹、洛阳令，就家写其书”；又《北堂书钞》卷一百四“赍纸写国志”条引王隐《晋书》云：“陈寿卒，诏河南尹华澹下洛阳令张泓，遣吏赍纸笔，就寿门下写取《三国志》。”张泓派人抄写的这个本子，是《三国志》最早的传抄本，由西晋政府正式收藏。以后《三国志》的传抄，大概都是根据这个本子，因此可以说它是《三国志》传抄本的“祖本”。上述两种出土的晋代写本残卷，与“祖本”出现的时间相距不远，很可能是从官府所藏“祖本”转抄而来。至于《三国志》的刻印本，即使是现今传世时间最久的宋刻本，在文字的存真上亦不及两种晋代写本，较之“祖本”及陈寿原稿，就更有相当的差异了。

三

缪钺先生还不惜花费宝贵的精力和时间，热情鼓励和大力帮助后进学者，从事《三国志》的整理和研究，这也是不容忽视的贡献之一。

1984年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“祖国的四川”丛书，约请四川大学历史系杨耀坤教授撰写其中的《陈寿与〈三国志〉》。杨曾是缪钺先生的研究生，接受任务之后，随即向先生请教撰写中应注意的问题。先生不仅对此事极表支持，而且把自己已经撰写完成而当时尚未出版问世的《三国志选注·前言》、《陈寿评传》二文底稿，都交给杨作参考。杨在文章中多处采用先生的精到意见，得益甚大，故而在文章的附注中特别加以说明，以表感激之情。

我于1978年忝列先生门墙，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之下，先后获硕士、博士学位。因喜爱陈寿之书简约爽洁，故平时多所观览。沉浸渐深，遂有心得，随时向先生报告求教。先生总是勉励有加，多方开示，并一再嘱咐我：须意见成熟后方能撰文发表。自1987年起，我陆续撰成《中华书局本〈三国志〉标点商榷》、《中华书局本〈三国志〉校勘拾遗》、《〈三国志·吴书〉七事质疑》、《中华书局本〈三国志·蜀书〉校勘拾遗》等文。这些文章在发表之前，大都经过先生的审阅，提出许多修改的意见。特别是上面第一篇，因系对整个中华书局本的标点问题分为十三类进行商榷，涉及面广，举例较多，先生审阅最为细心，花了很多精力。至今想起当时先生戴镜伏案的情景，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。1990年，时任陕西三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的周鹏飞先生，主编“中国六大史学名著丛书”，将其中《三国志注译》一书的撰写任务辱托于我。此书须先对《三国志》及裴注的全文进行再次校勘、标点，而后对《三国志》的全文进行注释和今译，不仅要求很高，而且分量极重，预计将接近三百万字。以一人之力完成这样的学术工程，在现今《三国志》的整理研究中似尚无先例，所以我在接受委托时一度有所犹豫。先生得知此事，认为我在学力和学风上已具备完成任务的条件，所以首先鼓励我知难而进，在学术研究上作出更大的成绩。在开始此项工作之后，先生又多次提出指导性意见，例如关于工作底本问题，他认为中华书局本有较好的基础，选用为工作底本是合适的；但是这个本子的校勘有较大的欠缺，标点也时有疏误，一定要先对其作全面的补充和校正，才能为下面的注释和今译提供准确的原文依据。关于注释问题，先生反复强调：史家注史，应当突出学术性，而不能象现今一些劣质的古籍注本，注释者本无相应的专业素养，只知翻检几本普通工具书胡乱出注。所谓突出学术性，不是在出注的文字上使用半文半白的语言，故作艰深，而是要在注文中尽可能完备地吸收当代历史学、考古学、古代汉语、古典文学、宗教学、民族学、哲学等学术领域的相关研

究成果，并以纯正简炼的白话文表现出来；至于史事、典章中重要者，必要时则应作简明的考证、论辨或补充，以正本清源。关于今译的要求，先生认为第一是必须准确，第二是尽量传神。《三国志》的今译如何才能传神？兼擅古典文学的先生提出自己的独到之见，即至少应注意两点：首先，魏晋是骈体文兴起的时代，《三国志》中的文字已受相当的影响，如果遇到骈句，应尽可能以对仗性的白话文句译出。其次，《三国志》中的韵文，如《曹植传》中引录的四言诗，都应以白话诗的形式译出，且断句也要与原句对应。我以先生的意见为指针，制定了周密的工作计划。经过三年多极其艰苦的努力，1993年底我终于完成了此项工作。全稿凡二百八十万字。其中，新作校勘六百八十餘条，比中华书局本原有的四百餘条校勘多出百分之七十；纠正中华书局本标点疏误四百餘处。在此可靠基础之上，注释和今译都尽力达到先生提出的标准。此时，周鹏飞社长已调任陕西人民出版社主编，此书遂改由该社出版。先生不仅为此书的封面赐以题笺，而且把自己的力作《陈寿与〈三国志〉》赐为序论冠首。1995年5月，全书共三分册正式出版。问世后谬受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，认为此书做到了校勘精细、标点精确、注释精当、译文精彩、印刷精良。我自己深知，没有先生的鞭策鼓励和悉心指点，此书不可能以这样的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。可是昊天不吊，先生竟在此书问世的前一年辞世仙归，感激，思念，悲怆，憾恨，种种感情此时一并涌起在我心中。

先生胸怀博大，对后进学者的热情帮助，并不限于与自己关系亲近的门生。此处仅举二例。1990年，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吴金华教授标点的《三国志》，由湖南岳麓出版社出版。吴是徐复先生的高足，与我同辈。先生为表示大力支持，特为吴赠“前言”一篇。1992年，陈寿的故乡四川南充市成立“陈寿与《三国志》研究会”，向先生请求指导。先生对此极为关心，但因目力衰损，故多次召我述说意见，要我记录下来，写信向南充方

面转告，又赠送自己主编的《三国志选注》数套，供南充市新建的陈寿纪念馆作陈列之用。至今研究会的会员们回忆起这些往事，依然感动不已。

现在，先生已偕师母长眠于风景清幽的青城山中。墓前的黑色大理石碑上，镌刻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一良先生亲撰的挽联：“文史回翔，绛帐春风三千弟子；诗词并美，灵谿妙谛一代宗师。”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。先生的道德文章，包括他在《三国志》整理研究上的突出贡献，将如环护着先生的青山绿水，永远留存于天壤之间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